

“李卓吾批评”曲本考

朱 万 曙

一、“李评”本的数量及存佚情况

署名“李卓吾批评”的曲本数量，早在六十年代，吴新雷先生就做过调查，共得到十五种，它们是：

《北西厢记》、《琵琶记》、《幽闺记》、《玉合记》、《红拂记》（以上五种均为万历间虎林容与堂刊本，上海图书馆、国家图书馆等处各有收藏）、《荆钗记》（万历间刊本，未标书坊名字，国图藏）、《明珠记》（未见藏本，据《荆钗》卷首记载著录）、《玉玦记》（同上）、《绣襦记》（同上）、《玉簪记》（万历间新都青藜馆刊本，上图藏）、《浣纱记》、《金印记》、《锦笺记》、《香囊记》、《鸣凤记》（以上五种均系万历刊本，未标书坊名字，号称“三刻五种传奇”，长乐郑氏旧藏）。^①除了这十五种外，吴书荫先生还发现一种李评《焚香记》^②。故截至目前为止，所知李卓吾批评曲本的数量为 16 种。

这 16 种“李评”曲本的存佚情况，吴新雷先生已有部分介绍，今据笔者调查，它们有十四种留于世，现补叙如下：

标明容与堂刊行的五种曲本除国图、上图有存本外，《琵琶记》、《幽闺记》、《玉合记》均收入《古本戏曲丛刊》第一集。惟所收《琵琶记》卷末有残缺，国图、上图藏本卷末均有三段批语，

现补抄如下：

琵琶短处有二，一是卖弄学问，强生枝节；一是正中带谑，光景不真。此文章家大病也，《琵琶》两有之。

《琵琶》妙处，只在描容、祝发、食姑嫜、尝汤药、厌糟糠数出，到此则不复语言文字矣！《西厢》、《拜月》亦只兄弟矣！读之者见五娘子形容，闻五娘子啼哭，即见之闻之亦未必若此详且尽也。文章之道，乃至是乎？

《琵琶》更不可及处，每在文章尽头复生一转，神物神物。“李评”《北西厢记》，除容与堂刊本外，尚有游敬泉刊本（全称为《李卓吾批评合像北西厢记》），西陵天章阁刊本（全称《李卓吾先生批评西厢记真本》），以及浙江图书馆收藏的《李卓吾批点西厢记真本》^③。《红拂记》亦有游敬泉刻本，藏上海图书馆。

《荆钗记》卷首提到的五种曲本，《玉玦记》未见藏本，《明珠记》有大连图书馆存本，全称为《李卓吾先生批评无双传明珠记》，而《绣襦记》则在“三刻五种传奇”之中^④。此外未见其他藏本。其出首有“总评”，因蔡毅《中国古典戏曲序跋集汇编》及吴毓华《中国古代戏曲序跋集》未予收录，故抄录如下：

昔闻之至人云，凡事以不尽为大家。如《明珠记》殊不尽也，而作者之意则似以为尽矣，此所以不能升为大家也。

传奇有曲有白有介有诨，如耳目口鼻不可相废。《明珠》一以曲收之，亦其病也。

又评：颇尽才人之致，未登大雅之堂，以评《明珠》其然乎！

凡瓶满者不鸣，瓶半者鸣，先正之格言也。天池乐府，鸣乎半乎满乎，可以定其品矣。

“三刻五种传奇”，曾为长乐郑氏旧藏^⑤，但《西谛书目》已不载此五种曲本，国图馆藏目录及卡片均未见。但《浣纱记》、《锦笺记》二种，国图仍有收藏，《金印记》为上图收藏，三本卷前各

有“总评”一篇，《锦笺记》卷首尚有未署名之“引”一篇。《浣纱记》“总评”：

故国报仇雪耻，谋士设计陷人，俱以美色投之，是美色不止利刃矣。世人何甘心利刃者之多也，此之谓自相吴越。

范大夫既以西子沼吴，后乃载之而去，识者谓渠恐越为吴续也。噫！于越忠矣，但大难为自家耳。一笑一笑。

西子可谓攻心上将。吴人受此大毒，而吴之惑于西子者较前更甚。吴人亦可谓甘心伏侍将军矣。噫！岂独吴人也哉！

西子杀人亦所甘心，可恨今人俱死于东家娘子之手耳。虽然情眼出西施，彼亦安知其为东家娘子哉！噫！

秃翁

《锦笺记》“总评”：

传奇中有《锦笺》，真合时之作也。有致有味有词，以之为举业，百发百中之技也，作者可谓大宗匠也矣！其最妙处是个尽而不尽，委有余姿。噫！诗文至此思过半矣，况传奇乎？

《金印记》“总评”：

人知季子父母兄嫂炎凉，不知此乃彼苍一副大炉冶也。大抵人非上根，不能无激而奋。昔人云，激而战之，无上之师，此有见之□也。如季子者非父母兄嫂如此激之，又乌能奋乎！余不为已往季子感恨炎凉，方恐将来季子不得遇如是圣父圣母贤兄贤嫂耳。势利不在家庭，犹得掩门谢之；惟在自家骨肉，避之不能，受之不可，方思出头，做个汉子矣！呜呼！天何仁爱英雄，百计提醒，千方激劝之也！

最可怜者是季子之妻，彼受舅姑伯无限楚毒，稍从夫子发泄之，又以下机见诮矣，凡为季子者须念之。

秃翁

“三刻五种传奇”虽不见于郑振铎《西谛书目》，也不见于国

家图书馆收藏，却收藏于台湾中央图书馆。张棣华《善本剧曲经眼录》^⑥做了介绍，此五种曲本为《浣纱记》、《金印记》、《香囊记》、《绣襦记》、《鸣凤记》，实即郑振铎先生原得之于陶兰泉的本子^⑦。笔者请台湾世新大学中文系丁肇琴博士复印了五部评本的总评，今将《香囊记》、《绣襦记》、《鸣凤记》总评抄录于下：

《香囊记》总评：

此邵半江表扬先德之作也。词虽陈色，却有文心。此中最可传者，无如朋友代难一节。末世有如此友谊，亦足传矣！

《绣襦记》总评：

据唐白御史《李娃传》，此妇有大识见、大主张、大经济，男子所不如也。夫何一经法华之手，装点出许多恶态，如马板汤之类，装腔拿班，种种恶态，不可言尽。及考杀马煮汤，乃元学士王元鼎与妓女顺时秀事迹，不干元和、亚仙之事，所称点金为铁，非耶？

《玉玦》主抑青楼，《绣襦》反之。相传薛君受青楼之赂，特与郑若庸反者也。但娟奴姓李，亚仙亦姓李，今评两家传奇者又姓李，李姓者不为妓女，则为和尚，大难为太上老君也已。客曰：若况老君又有一姓李道士矣！放笔大笑。

《鸣凤记》总评：

凡传奇之胜，乃在结构玲珑，令人不测。如此部传奇，填词度曲，时入胜境，亦可谓极尽才人之致矣。而小小串插，良工苦心，不谓无之。只恨头绪太多，支离破碎，难登作者之坛耳。

严家举动，赵鄢施为，今人俱知笑之。余犹恐阳却其人而阴用其言者之多也。各人须自照之，毋轻动雌黄之舌，何如？

赵鄢诸人，是大功德主。何也？各个俱有此心，而彼二

人者，独以身当其丑，非功德而何？一笑一笑。

笔者曾详较上图藏《金印记》与张氏所录《金印记》出目，其第八出上图本为“逼钗赴选”，后者则为“逼卖钗梳”，故“三刻五种传奇”本，与国图、上图所藏的三个曲本是否为同一版本，尚待较考。

二、“李评”曲本的真伪问题

“李评”曲本的真伪问题，一直是一桩悬案。李氏门人汪珂在《续刻李氏书序》中说道，李卓吾“一死而书益传，名益重，……海以内无不读先生之书者，无不欲先生之书而读之者，读之不已或并其伪者而亦读矣。夫伪为先生者，套先生之口气，冒先生之批评，欲以欺人而不能欺不可欺之人也，不乏识者，固自能辨之。第浸至今日，坊间一切戏剧、淫谑刻本批点，动曰卓吾先生，耳食辈翕然艳之，其为世道人心之害不浅，先生之灵必有馀恫矣。”^⑧该文署明写作时间为万历戊午，即万历四十六年，文中对李贽去世后伪托其名刻书的情形作了描述，并且提及伪书中，包括“坊间一切戏剧、淫谑刻本批点”。

如果说，汪珂还只是提及了“李评”曲本的伪托问题，钱希言的《戏暇》则明确地指出了伪托者与伪评的剧目：

比来盛行温陵李贽书，则有梁溪人叶阳开名昼者，刻书摹仿，次第勒成，托于温陵之名以行。往袁小修中郎尝为余称，李氏《藏书》、《焚书》、《初谭集》、《批点北西厢》四部。即中郎所见者，亦止此而已。数年前，温陵事败，当路命毁其籍，吴中钁藏，书板并废，近年复大行，于是李宏父批点《水浒传》、《三国志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红拂》、《明珠》、《玉合》数种传奇及《皇明英烈传》，并出叶笔，何关于李。^⑨

钱氏认为，叶昼是托名李卓吾评点的人；于戏曲评点，他只听说袁中郎说过有《批点北西厢》一部，因而认为像《红拂》、《明

珠》、《玉合》等传奇的评点，“并出叶笔，何关于李”。

认为“李评”曲本为伪托者还有王骥德与凌濛初。王骥德在《新校注古本西厢记》卷后所附评语中，对李卓吾的《西厢记》评论大为不满，甚至咒骂李卓吾“死晚矣”，同时又说：“顷俗子复因《焚书》中有评二传（指《琵琶记》、《西厢记》——笔者按）及《拜月》、《红拂》、《玉合》诸语，遂演为乱道，终帙点污，觅利瞽者，余戏谓客，是此老阿鼻之报。客为一笑。”王氏为何对李卓吾如此憎恨这里没必要讨论，但他认为“李评”曲本均为“俗子”和“觅利瞽者”的伪作，与钱希言的看法则是一致的。凌濛初只是提到，“李评”《琵琶记》系伪托之作，他在校评《琵琶记》凡例中说道：“至近时有贗李卓吾批点本，夫真卓吾且不解曲，况效顰拾唾者，益不足论矣。”

六十年代，吴新雷先生在调查“李评”曲本的同时，对其真伪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，认为“明代的书商的确有假冒伪托的恶习，但决不能因此而将李评本一概加以否定。”^⑩这为笔者在考察“李评”曲本时提供了既“疑古”又“信古”的思路，通过比较、分析，笔者认为，现存的“李评”曲本，先行由容与堂刊行的五种曲本，应基本肯定出自李氏之手，其余的则只能存疑。理由如下：

首先，容与堂所刊行的五种“李评”曲本，都是李卓吾曾经评点或有过评论的。《焚书》卷四收有《拜月》、《玉合》、《红拂》评论文字各一篇，它们虽未标明为序文，但篇幅都不长，议论却很精辟，可能就是在评点三剧时写下的序跋^⑪，至于《琵琶记》和《西厢记》，李氏在《与焦弱侯》的书说道：“古今至人遗书抄写批点得甚多，……《水浒传》批点得甚快活人，《西厢》《琵琶》涂抹改窜得更妙”，^⑫所谓“涂抹改窜”，显然是对这两部戏曲作品进行批点。既然李卓吾对这五部作品都有论述和评点，容与堂刊行的五部“李评”曲本的真实性和李氏从未提及的“李评”曲

本，应该更为可信。

其次，从版本形态考察，容与堂的五种刊本，除《玉合记》的刻印形式与批语都比较简略外，其余四种，无论在形式上还是批语上都比其他刊本繁富不少。在形式方面，容与堂刊本不仅有出批、眉批，还有不少的夹批，尤其是尾批，更为容与堂本所独有；容与堂本的评点符号，既有圈点，还有不少的抹号，这在其他刊本中也是没有的。在批语方面，容与堂刊本与其他刊本的差别更为明显：一是数量差别。前者批语数量繁富，每出常达十条以上，《琵琶记》第五出，《红拂记》第十七出、十二出的批语均达23条，《北西厢记》“僧房假寓”一折的批语多达27条；而后者的批语每折一般仅3至5条，很少有超过10条的。二是长短差别。容与堂刊本的批语有一些比较长，像《琵琶记》第四出“蔡公逼试”中有两条批语均有47字，《西厢记》“僧房假寓”一折评论红娘的尾批则有56字，其他刊本中的批语则较短，多为一、二句话的随评。

容与堂刊本的版本形态与其他刊本的总体差别在于：前者是批点细致、繁富的评点本，其刊刻形式也服从于批点的细致显得多样化；后者的批点则比较简略，刊刻形式也较为简单。这种情形，与袁中郎的两段记载相吻合。他在《游柿居录》中记曰：“袁无涯来，以新刻卓吾批点《水浒传》见遗……记万历壬辰夏中，李龙湖方居武昌朱邸，余往访之，正命僧常志抄写此书，逐字批点”^⑬；在《李温陵传》中又说李卓吾“所读书皆抄写为善本，东国之秘语，西方之灵文……下至稗官小说传奇，宋元名人之曲，雪藤丹笔，逐字雠校，肌理分，时出新意”^⑭。袁中郎所记李氏评点的虽是《水浒传》和“稗官小说传奇，宋元名人之曲”，但他记录了李氏评点时的态度，或者“逐字批点”，或者“雪藤丹笔，逐字雠校，肌理分，时出新意”，换言之，李氏的评点，是极其认真极其细致的，容与堂刊本的版本形态，恰恰反映出批点者具有极为认真细致的批点态度，从而说明，它们是出自李卓吾之手的

评点本。

第三，从李卓吾对五部剧作的评论与评点本中的观点看，两者之间乃至某些语言都是一致的。李氏在《焚书》卷三《杂说》一文中说，“《拜月》、《西厢》，化工也；《琵琶》，画工也”；又评《琵琶记》说：“惟作者穷巧极工，不遗余力，是故语尽而意亦尽，词竭而味索然，亦随以竭。”这种推崇《西厢》、《拜月》，而认为《琵琶记》失之“工巧”的观点，在容与堂刊本中得到了一致的发挥。《西厢记·红娘请宴》一折，红娘唱有〔耍孩儿〕一曲，其眉批道：“如此等曲已如家常茶饭，不作意不经心，信手拈来，无不是矣！所以谓之化工也。”这里所说的“如家常茶饭，不作意不经心，信手拈来”，与《杂说》中的“造化无工”的观点精神完全一致；第十四出“堂前巧辩”，在红娘反驳老夫人的那段道白处，不仅加了圈号，还有这样几句眉批：“红娘真有二十分才，二十分识，二十分胆。有此军师，何攻不破，何城不克，宜于莺莺城下乞盟也哉！”以“才、识、胆”赞美红娘的说法，在李氏文章中也有踪迹，李氏《焚书》中，即收有《二十分识》一文，其开头几句谓：“有二十分见识，便能成就得十分才……有二十分见识，便能使发得十分胆。”^⑮《幽闺记》第十六出“速离兵火”之〔满江红〕一曲眉批道：“此等曲都如家常说话，妙妙”；第二十八出“兄弟弹冠”出批说：“曲与关目之妙全在不费力气，妙至此乎！”它们与“化工”说的精神同样相通。而《琵琶记》的评点，评语一方面表现了对赵五娘形象的感动和对相关段落的肯定，却有不少的批评，如第九出“临妆感叹”的一则眉批道：“填词太丰，所以逊《西厢》、《拜月》耳”；其剧末又批评说：“《琵琶》短处有二，一是卖弄学问，强生枝节，一是正中带谑，光景不真，此文章家大病也，《琵琶》两有之。”这些批语，不仅与《杂说》中崇《西厢》、《拜月》而非《琵琶》的观点一致，与评《琵琶》为“画工”之作，“穷巧极工”的评论也是血脉相通的。《红拂记》的评点与《焚

书》中评“红拂智眼无双，虬髯弃家人海，越公并遣双妓，皆可师可法、可敬可羨”的观点同样一致，评语中多次评红拂为“具眼”，虬髯翁为“英雄”，对杨素也大加赞赏。至于《玉合记》，前面曾说到它的评点比较简略，实际上是与李氏对它评价不高有关，《焚书》卷四对它的评价是：“此记亦有许多曲折，但当要紧处却缓慢，却泛散，是以未尽其美，然亦不可不谓之不知趣矣。韩君平之遇柳姬，其事甚奇，设使不遇两奇人，虽曰奇，亦徒然耳。”正因为如此，该剧评点中推崇性的评语便不是很多，第二十三出“祝发”，安禄山兵已逼近，柳姬改扮尼姑逃难，这时作者还让侍女轻娥赞赏她“就似佛前的天女”，眉批说：“那得如此从容，删”，并在这段对白处加了删号。这一眉批显然是“当要紧处太缓慢”批评的具体化。第三十六出“还玉”，许俊从沙吒利府上夺回柳姬，眉批赞赏说，“世间有如此快人”，“真汉子，真豪杰，真丈夫，今天下亦有其人乎！”这与李氏评论的“两奇人”（另一人指李王孙）的作用也是相联系的。

一般说来，伪托者的作伪，当然要对被伪托者的文字风格和观点有所了解，但是就评点而言，有一个问题可以帮助我们辨伪：即使伪托者对被伪托者的观点理解得再深入，也需要付诸评点实践，何处该褒，何处该贬，且要体现被伪托者的观点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评点得既合理合情，又与众人已知的观点相一致，这在伪托者那里难以全然做到；部分做到，仍会留下破绽。容与堂的五种刊本，评点的文字与李卓吾已有的评论文字在观点上不仅一致，而且所评的地方也合情合理（如上举《玉合记》两处评点），因此，它们应该是出自李卓吾之手的评点本。

第四，从现存“李评”曲本的“组织形态”上看，容与堂刊本均标明堂号，并不隐晦，五种刊本也没有标之以“初刻五种”之类的名称，从而也就不带有浓厚的“觅利瞽者”的色彩。而其他的刊本则显然处在“组织形态”之中。《荆钗记》卷首的《合论五

部曲白介诨》等六篇“合论”，说明同时刊刻了《荆钗》、《明珠》、《玉玦》、《绣襦》、《玉簪》五种曲本；而“三刻五种传奇”，则由《浣纱记》卷首《三刻五种传奇总评》明白告示，这是书商继容与堂五种刊本及《荆钗记》等五种刊本后，又推出的以“五种”为固定数目的曲本。这种“组织形态”显然带有书商伪托射利的色彩。更为可疑者，除了《玉簪记》一种刻有“新都青藜馆”刊刻外，其余者连书坊名称都未标明，这就难怪人怀疑它们不是出自李卓吾之手的评点本了。反过来看，它们的伪托痕迹倒是证明了容与堂五种“李评”曲本的可信性。

最后，我们对怀疑“李评”曲本的也略加辨析。就前引的汪珂、钱希言、王骥德、凌濛初的怀疑文字看，他们在提出“李评”曲本为伪托的评点本的同时，并没有提出可信的论据，更缺少对不同刊本差异性的分析，而只是一种武断。这在书籍和其他信息传播并不通畅的环境中，不能作为“李评”曲本皆系伪托的依据。例如凌濛初的说法就经不起推敲，他说“真卓吾且不解曲”，事实上，李卓吾是率先重视戏曲小说的人物，他的评论戏曲的文字就收载在《焚书》之中，他可能不像凌氏那样精通曲律，却不妨从思想的、艺术的角度“解曲”；像钱希言的怀疑，其论据只是袁中郎的话，不错，袁中郎只看到李氏评批的《西厢记》，但却不能排除还有袁中郎未见到的其他“李评”曲本。至于王骥德的记载，它们恰恰包括了容与堂的五种刊本，但又恰恰是一种高度情绪化的记载，在该条评语中，他咒李卓吾“死晚矣”，诋毁李氏为“异端之尤，不杀身何待”^⑩，因而他不仅将“李评”曲本视为“俗子”之伪托，而且将其归之于“是此老阿鼻之报”，对这样的记载，我们恐怕是难以作为可信的证据来使用的。

通过以上的分析，我们认为，容与堂刊刻的五种“李评”曲本是出自李卓吾之手的评本，而其他的曲本，则可能是出自叶昼或其他人之手伪托李卓吾评点的本子。

三、“李评”本的重要影响

正如汪珂所说，晚明时期“海以内无不读先生之书者，无不欲先生之书而读之者，读之不已或并其伪者而亦读矣”。“李评”曲本的扩增与影响，正是时代的结果。自容与堂五种曲本刊行后，《荆钗》等五种伪托李氏评点的曲本随之出现，接着又有“三刻五种传奇”刊行。它们“伪为先生者，套先生之口气，冒先生之批评”，尽管“也不乏识者，固自能辨之”，但更多的读者却未必“自能辨之”，这就使包括容与堂刊行的各种“李评”曲本都风靡一时，并进而对晚明戏曲评点本的大量刊刻产生了重要影响。我们可从两个方面予以考察：

（一）书商照搬“李评”本的批点进行翻刻，却改换评点者的署名。这种手段对书商来说最为省事，它们完全是“射利”目的之下的产物。我们考察明代戏曲评点文献，须格外注意。通过调查，我们至少发现以下五种评点本完全抄袭“李评”本的评点：

1. 宝晋斋刊刻之《明珠记》，该本上卷终题“汤海若先生批评无双传明珠记”，没有眉批，有圈点，而出批与“李评”《明珠记》完全相同。^{①⑦}

2. 怡云阁刊刻之《浣纱记》（收入《古本戏曲丛刊》初集），该本上卷末亦题“汤海若先生批评浣纱记”，亦只有出批，批语全同于“李评”《浣纱记》。

3. 未标书坊名《玉茗堂批评焚香记》（收入《古本戏曲丛刊》初集），与“李评”《焚香记》“无论版刻形式，还是内容本身以及每出后的总评都相同。所谓玉茗堂批评本，实际上是《李卓吾批评焚香记》的翻版。”^{①⑧}

4. 师俭堂刊《汤海若先生批评西厢记》。此本眉批与出批全数抄袭容与堂刊李评《北西厢记》，只是将出批的刻印体改成手书体，在前几折，还将尾批刻了出来，并以大字标出“批”，但后面则将

尾批省去，惟卷首有署名“海若汤显祖”的草书题词一篇^{①9}。

5.《殊订西厢记》，此本为明末刻朱墨套印本，首页题“东海月峰孙鑛先生批点，后学诸臣校阅”，但该本的眉批、出批大多与容与堂所刊李评《北西厢记》相同，少数几条照搬陈继儒评本的批语，而剧末总批亦照搬“陈评”。

（二）仍用李卓吾评点名义，重新刻印。这一情形，主要发生在《西厢记》刊本及《红拂记》刊本上。它有两种情形：

一是袭用容与堂所刊《北西厢记》的批评内容，崇祯间天章阁刊印的《三先生合评西厢记》的眉批系捏合各家评本内容而成，但所谓“三先生”（汤显祖、徐渭、李卓吾）的出批，凡李卓吾的批语大多袭自容与堂本，文字全同者有8条；文字略有出入者9条，这种出入，只是字数的增减，意思未变，如第二折第四套《琴挑》（容与堂本为第八出《月不听琴》），容与堂本出批是：“无处不似画”，而此本则为：“无处不似画，无处不似画。”又第二折第二套《初筵》（容本为第七出《红娘请宴》）出批为：“此出曲如家常茶饭，不作意，不经心，信手拈来，无句不妙，所以为‘化’。”这是将容本中的〔耍孩儿〕一曲眉批用来作了出批（文字略有不同），而替代了容与堂本原有的“文已到自在地步矣”的出批。只有第一折第三套《酬韵》（容与堂本为第三出《墙角联吟》）的出批完全不同，容与堂本为：“如见如见，妙甚妙甚”，而该本替换为：“非但能言人不可得，正索解人亦不可得。”故有出入的仅两条，其中一条，仍是容与堂本的眉批，除此本李卓吾名下的出批袭自容与堂本外，游敬泉刊刻李卓吾先生批评《红拂记》的眉批也袭自容与堂刊本，但少刻了相当多的眉批^{②0}。

二是评点内容不同于容与堂的刊本，形成另外一种虽署李卓吾批评之名却另为评点的本子。这类刊本主要是《西厢记》评本。首先有万历三十八年（1610）起凤馆刊印之《元本出相北西厢记》，该本眉栏镌王世贞、李卓吾的批语，故又称“王、李合评

本”，无出批和总评或剧末评，均为眉批，其评语内容全不同于容与堂本。由于该本是确知年代的刊本，是否受容与堂本影响尚难确定。其次是游敬泉刊《李卓吾批评合像北西厢记》，其眉批“都是从起凤馆刊王世贞、李卓吾合评本照搬的，搬的时候居然没有做不可省略的一些技术工作”^②，因而这只是起凤馆刊本的抄袭评本。再次是西陵天章阁和浙图藏《李卓吾先生批点西厢记真本》，两者版式与每出批语近似，而和容与堂本相比，“相同的不多，一般来说，都要简短些”^③，故而是容与堂本、起凤馆本之外的又一《西厢记》评本。

《三先生合评元本琵琶记》是一个情形更加复杂的刊本。该本与《三先生合评西厢记》当同出一个书坊，所谓“三先生”均指李卓吾、汤显祖、徐渭。然两者评语构成情形大为不同。《三先生合评西厢记》因为徐渭曾有评点，汤显祖也可能作过评点，故李卓吾的评语基本照抄容与堂本，不需作捏合；而《三先生合评元本琵琶记》的三人评语则存在严重捏合的情形，这是因为徐渭、汤显祖未必评点《琵琶记》，所以该本评语，一部分从他本借来，如评音律的评语，从凌濛初评校《琵琶记》本抄来，如该本第五出〔前腔〕“公公可怜，俺爹娘望你周全”一曲的眉批：“此二曲犯〔月上海棠〕，凡作〔五供养〕者皆从此，不知本调末句七字。试查《拜月》、《杀狗》、《白兔》、《八义》等记便知。”此段眉批抄自凌评本，仅略去首句“此二曲人皆不知其犯〔月上海棠〕者”。一部分袭自容与堂本李评《琵琶记》，一部分可能就是书商的自撰。而袭自容与堂本的评语，一部分归于李卓吾名下，一部分归于徐渭名下，一部分归于汤显祖名下，由于出批不够，又不得不将容与堂本的眉批拉来凑数。因此，该本实是一个既抄容与堂本又捏合其他评本内容的本子，其中的李卓吾评语，既有抄自容与堂本的批语，又捏合了其他评本的批语。

（三）署名其他人的评点本，虽不是照抄“李评”本的评点内

容，却明显受到影响。兹分述如下：

1. 容与堂刊李评《北西厢记》：受其影响者有师俭堂刊《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西厢记》，几礼居藏《汤海若先生批评西厢记》、笔峒山房刊《新刻徐笔峒先生批点西厢记》，以及《新刻魏仲雪先生批评西厢记》。这几种刊本所受容与堂刊李评《北西厢记》影响的情况，蒋星煜先生已分别有考论^{②③}，这里不赘述。

2. 容与堂刊李评《琵琶记》：该本所影响的其他署名者的评本，有师俭堂刊《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琵琶记》、《新刻魏仲雪先生批评琵琶记》两种。关于前者，黄仕忠《琵琶记研究》一书中认为是一“贗本”，并谓“其批语亦系抄撮而成”^④。从现存评本考察，其第二出“高堂称庆”、第四出“蔡公逼试”、第十一出“蔡母嗟儿”，第十五出“金闺愁配”，第二十三出“代尝汤药”、二十八出“中秋赏月”等出，均有“李曰”、“王曰”的评语，故极有可能袭自起凤馆刊刻的王、李合评《琵琶记》。但该本的一些眉批、出批以及剧末批仍系新撰，且有一定价值。魏仲雪批评本当较“陈评”本晚刊刻，其眉批、出批大多袭自容与堂本，出批有13条袭自容与堂本，另有3条出批乃由容与堂本眉批改成，另有8条与“陈评”本相同或相近。

3. 容与堂本李评《幽闺记》影响到师俭堂刊《鼎镌幽闺记》，尽管“陈眉公批评”本大多不同于李评本，但有两个地方仍透露了受影响的信息：一是第二十六出“皇华悲遇”出批，李评本为“此出关目妙极，全在不说出”，陈评本为“此出关目极妙，全在不说出”，只是将“妙极”换成“极妙”；二是剧末总批，李评本仅有“《拜月》曲都近自然，委疑天造，岂曰人工”三句，而陈评本却有较长的一段总评，但开头三句则与李评本全同，故可知陈评本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李评本的影响。

4. 容与堂刊李评《玉合记》影响至师俭堂刊陈继儒批评《玉合记》，后者眉批多袭自前者，如第四出“宸游”，末、丑拿

“想”字打诨及[千秋岁]一曲，两本眉批均为“可厌，删”、“太烦，此等处白宜简”；第十九出“发难”中，净扮安禄山道：“这是秀才官，只有那四书学问。”李评本的眉批为：“记得《四书》并左氏摘奇，便是有学问的了，如何不做官”，陈评本的眉批为：“记得《四书》、左氏摘奇，便是有学问的了，如何只是秀才官。”尚有不少眉批都相同，显然陈评本受到了李评本的影响。

5. 容与堂刊李评《红拂记》亦影响师俭堂刊陈继儒评《红拂记》。表面看来，陈评本未抄李评本一条出批和眉批，但仔细比较，仍见出其受影响痕迹。一是眉批，虽字句不同，但批点的地方和文意却相同，如第一出的下场诗有“打得上情郎红拂妓”一句，李评本眉批为“‘妓’字不可以目红拂”，而陈评本眉批为“红拂不是妓”；第二出“杖策渡江”末（渔翁）有几句道白并唱[古轮台]曲，李评本的眉批为“渔翁不俗”、“惟英雄识英雄，流辈如犬羊一般，如何识得”，陈评本的眉批则为“知趣哉渔翁”、“鉴赏甚高”。尤为破绽的是第十出“侠女私奔”中红拂见到李靖后唱的[前腔]曲，李评本用尾批：“这是千古来第一个嫁法”，陈评本则改为眉批：“千古第一嫁法”，李评本还眉批道：“即此一事，便是图王定伯手段，岂可以淫奔目之”，陈评本则将此则眉批变成了出批，只是将“岂”字更成了“何”字。由此可见，该本与《幽闺》、《玉合》一样，虽有新的评点内容，却与李评本有着先后影响的联系。

要之，署名李卓吾评批的曲本对于晚明戏曲评点本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。如果说，第一种情形只是书商为“射利”而重复翻刻，并加剧了伪托之风气，第二、三种则都提供了一些新的评点内容，不可一概否定；而值得注意的是，自“李评”曲本刊刻后，特别是容与堂的五种曲本刊刻后，它们就成了后续评点本仿效和借袭的对象，这说明李卓吾的评点不仅是书商招徕读者的一种手段，也是其他评点者们（如陈继儒）努力接近的评点目标。

注：

①吴新雷：《关于李卓吾评批的曲本》，原载《江海学刊》1963年4月号，收入《中国戏曲史论》，江苏教育出版社，1996。

②其版本介绍，见吴书荫整理本《焚香记》前言。该本今藏首都图书馆。

③据蒋星煜《李卓吾批本〈西厢记〉的特征、真伪与影响》一文，尚有“温陵卓吾李贽评、潭阳太华刘应袭梓”的《李卓吾先生批评西厢记》一种，然不知其收藏处。见《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》93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7。

④郑振铎：《劫中得书记》第四十三条《李卓吾评传奇五种》介绍“三刻五种传奇”为《浣纱记》、《金印记》、《绣襦记》、《香囊记》及《鸣凤记》，然郑氏所引《三刻五种传奇总评》所论五剧无《绣襦记》而有《锦笺记》。

⑤见郑振铎《劫中得书记》第四十三条《李卓吾评传奇五种》，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，1956。

⑥见该书第156—160页，台北文史哲出版社，民国六十五年（1976）。

⑦参见笔者《李卓吾评批的〈三刻五种传奇〉》，载1999年1月23日《中国文化报》。

⑧载《续焚书》卷末，中华书局排印本，1961。

⑨钱希言：《戏暇》卷三《贻籍》。

⑩吴新雷：《关于李卓吾评批的曲本》。

⑪《拜月》一文，在容与堂所刊“李评”《出闺记》中被刻于卷首，当作序文。

⑫《续焚书》卷一。

⑬袁中郎：《游柿居录》卷九，第211页，上海远东出版社，1996。

⑭载《焚书》卷末，中华书局排印本，1961。

⑮见《焚书》卷四。

⑯王骥德：《新校注古本西厢记》卷后所附评语。

⑰宝晋斋所刻评点曲本，除“汤评”《明珠记》上海图书馆有藏本外，国图亦收藏三种：《明珠记》、《绣襦记》、《鸣凤记》，版本著录为明刻清初读书坊重修本，其《明珠记》与上图本版式内容完全相同。《鸣凤记》卷末亦题“海若先生批评鸣凤记”，《绣襦记》上下卷则未题批评者名字，两本均无眉批而有出批，颇疑两剧出批与“李评”《绣襦》、《鸣凤》相同。

⑱吴书荫：《焚香记》前言，中华书局1989年版。

①⑨蒋星煜：《汤显祖评本〈西厢记〉是伪装的李卓吾本》一文分析的是几礼居藏“汤评”本，列出与本评本相同的七出批语，却未列两本不同的批语；所引“汤评”本第二十出批语与容与堂李评本确是不同，然上图所藏师俭堂本批语全同于容与堂本，故知两者为不同评本。

②⑩游敬泉刊本藏上海图书馆，上卷残至第四出，下卷末页亦残，其版式不同于容与堂本，字体粗扁，其出目亦不同于容与堂本，如第四出，容与堂本为《天开良佐》，该本则为《威神指化》。

②⑪②②见蒋星煜：《李卓吾批本〈西厢记〉的特征、真伪与影响》。

②③各参见蒋星煜《陈眉公评本〈西厢记〉的学术价值》、《汤显祖评本〈西厢记〉是伪装的李卓吾评本》、《徐奋鹏校刊的评注本〈西厢记〉和演出本〈西厢记〉》、《明容与堂刊本李卓吾〈西厢记〉对孙月峰本、魏仲雪本之影响》，均载《〈西厢记〉的文献学研究》。

②④见该书中《陈眉公批评本〈琵琶记〉是贗本》一文。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，1996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